通古开新:吴兴华诗学初论

陈 国 球

((台湾)清华大学,台湾 新竹)

摘　要: 吴兴华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早慧诗人。可惜身逢乱世,抗战时期身在沦陷的北平,以后又经历国共内战;50 年代因应时代转变,作品产出变少,60 年代中期英年早逝;然而他却留下非常有份量的作品,后人初步整理成五卷,其创作、翻译以及评论,都非常值得研究。吴兴华早年在《新诗》与《文学年报》发表有关现代诗选本与《唐诗别裁》的评论,显示出开阔的视野与深刻独到的眼光。1941 年提交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借用英国剑桥批评学派蒂尔雅德《诗之直与曲》的理论,并作出调整修正,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成绩亮眼;更是下一阶段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 吴兴华;中西诗学;诗选;实际批评;诗之直与曲

中图分类号:I 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4)01-0109-10

一、前　言

1976 年 2 月 9 日到 10 日《中国时报》副刊登载了夏志清传诵一时的《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这篇文章之所以传诵,因为它引发了台湾文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夏志清与颜元叔就"新批评"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应用之适切与否,展开了一场火药味非常浓厚的笔战;此外,这封信还误传了钱锺书的死讯,由此见到 20 世纪 70 代的讯息流通不易,乃至有这类的错误传闻。夏志清此信开首引用了好友宋淇的话说:

> 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①

宋淇把吴兴华与陈寅恪及钱锺书并列,可见在他心中吴兴华学术水平之高。本文就以吴兴华的诗学论述为焦点,探析这位诗人批评家在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先后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及北平崇德中学。14 岁开始发表诗作,②次年又在吴奔星主编的《小雅》发表新诗;③16 岁就有评论文章《谈诗选》与《谈田园诗》在当时诗坛重要刊物《新诗》发表。④ 同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不久就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主办《文学年报》发表《〈唐诗别裁〉书后》。⑤ 1938 年认识宋淇,两人合编《燕京文学》;又因宋淇与上海期刊《西洋文学》的关系,在此发表大量译介西方文学的作品。1941 年 5 月,他以英文写成大学毕业论文

收稿日期:2023-06-08

作者简介:陈国球,(台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

① 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中国时报》副刊,1976 年 2 月 9—10 日。

② 吴兴华:《露》,《世界日报 · 学文周刊》第 7 期,1935 年 4 月 15 日。

③ 《歌》发表于 1936 年 8 月出版的《小雅》第 2 期;在同一诗刊的第 5—6 期合刊(1937 年 3 月)则有《花香之街》及《室》两首。

④ 吴兴华:《谈诗选》,《新诗》第 2 卷第 1 期(1937 年 4 月),第 111—114 页;吴兴华:《读田园诗》,《新诗》第 2 卷第 2 期(1937 年 5 月),第 218—221 页。

⑤ 吴兴华:《〈唐诗别裁〉书后》,《文学年报》第 4 期(1938 年),第 27—228 页。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1941);①由此可以见到他如何绾合中西诗学。北平沦陷期间,他继续在创作上多方试验,并广泛阅读中外文学,1942 年译《雷兴自论》(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Lessing über sich selbst”),1943 年译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的《歌德与中国》(“Goethe und China”),发表论文《黎尔克的诗》,翌年出版中德文对照的翻译《黎尔克诗选》。

1949 年以后,政局丕变,吴兴华的学术以至文学生涯,跌宕起伏;创作渐少,但仍然留下一些重要的著述和思考纪录,例如在传统文史研究上,20 世纪 50 年代有《读〈通鉴〉札记》,以及《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②西洋戏剧方面,他在 1956 年著有《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1957 年有书评《克利斯朵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著,戴镏龄译〈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及相关论文《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1963 年又有《〈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③ 此外,他还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包括 1963 年的三篇文章: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论趣味的标准》(Of the Standard of Taste),卡斯忒尔维特洛(Lodovico Castelvetro, 1505-1571)的《亚理斯多德诗学疏证》,洛卜·德·维迦(Lope de Vega, 1562-1635)的《当代写喜剧的新艺术》(*Arte nuevo de hacer comedias en este tiempo*)等。④

在这个文学养成的过程中,吴兴华渐渐建构了汇通中西古今的诗学。由于时局不靖,世变无常,他的著述长期被现代文学史家忽略;却又因缘际会,以不在场的形式流转在外,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大陆地区以外的文学发展;直到世纪之交因为资料逐渐浮现,其才其学乃重新受到关注。有关吴兴华诗学之整体发展、流转,与在文学史上从隐至显的旅程,很值得我们深究。本文是个人探讨吴兴华诗学的系列论文第一篇,先就其诗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作出考析,作为日后全面整理的基础。

二、选本与诗学之一:《谈诗选》

16 岁的吴兴华在文坛重要刊物《新诗》月刊一连两期发表相当精彩的评论,令人眼前一亮。其中《谈诗选》一篇刊于《新诗》第 2 卷第 1 期的“新诗座谈”栏目之内。吴兴华在文章开篇先举出 20 世纪初年风行一时的恩特美雅(Louis Untermeyer, 1885-1977)《现代美国诗选》(*Modern American Poetry*)的前言作为依据。恩特美雅这本选集初版于 1919 年,到 1950 年共有七版,非常畅销,据说影响了超过百万美国读者。⑤ 他引用恩特美雅的意见说:

---

① Wu Hsing Hua,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Yenching University, 1941.

② 吴兴华:《读〈通鉴〉札记》,《燕京学报》第 39 期(1950 年 12 月),第 243—260 页;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 年第 4 期(1988 年 8 月),第 1—15 页。

③ 吴兴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1 期(1956 年 3 月),第 105—126 页;吴兴华:《(书评)克利斯朵夫·马洛著,戴镏龄译〈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西方语文》1957 年第 1 期(1957 年 3 月),第 111—115 页;吴兴华:《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外国文学研究辑刊》第 14 辑(1990 年 8 月),第 1—47 页;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文学评论》1963 年第 6 期(1963 年 12 月),第 78—113 页。

④ 休谟著,吴兴华译:《论趣味的标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5 辑(1963 年 2 月),第 1—18 页;卡斯忒尔维特洛著,吴兴华译:《亚理斯多德诗学疏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6 辑(1963 年 10 月),第 1—26 页;吴兴华译:《当代写喜剧的新艺术》,《戏剧理论译文集》第 9 辑(1963 年 3 月),第 1—13 页。

⑤ 参考 Richard Eberhart, “On Anthologies including *The New 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Poetry*, The American Poetry Review, Vol. 4, No. 1 (1975.1/2), pp. 35-37; Craig Abbott, “Publishing the *New Poetry*: Harriet Monroe´s Antholog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11, No. 1 (1984.3), pp. 89-108; Craig Abbott, “Untermeyer on Eliot,”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15, No. 1 (Summer, 1988), pp. 105-119.

> 诗选有两种,一种是限定了十五或二十余个诗人,来代表一个时期的诗;另一种是普遍的将一个时期的诗介绍过来,所选的诗人也当然广泛得多了。……头一种是较精深的对于几个诗人的作风的认识,这几个诗人当然是必须能够代表这时期的。后一种能给人一个大略的对这时期诗的印象。前一种较偏重人,后一种则偏重时代了。①

在这段引论之后,吴兴华就批评当时既“没有一本能代表时代的”新诗选,也没有“称得上是一本标准的第一种的诗选”;所见的诗选都是“一胎而出”。② 文中罗列一些当时诗选经常收录的诗人和诗作,例如胡适、沈尹默、沈玄庐、周作人、刘大白、刘复、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汪静之、冰心等;以他心中的评价标准,即文中所谓“诗的价值”来说,这些诗人诗作并不高明。他所能肯定的常见收录的诗人只有: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朱湘、潘漠华几位。他另外举出一本诗选作为对照:

> 说来也惭愧,外国对于中国诗认识本少,对于中国的新诗认识更少,我们还有一本极其卓越的《现代中国诗选》。实在说起来这本诗选比我们现在所有的诗选,全都高出多多。③

所谓“外国”,指的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英译本,于吴兴华为文一年前(1936 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 *Modern Chinese Poetry*,其时编者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和陈世骧(1912—1971)都活跃在北京,书出版后在中国也颇有反响;④所以这算不得是很遥远的知识。吴兴华认为这本选集选取的作品是当时的批评家所未及关顾的:

> 这本诗选除了周作人、俞平伯、邵洵美外,剩下十二人全都是很重要的诗人。⑤

这十二人分别是:陈梦家、废名、何其芳、徐志摩、郭沫若、李广田、林庚、卞之琳、沈从文、孙大雨、戴望舒、闻一多。当然吴兴华此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褒扬艾克敦和陈世骧的诗选,而是要揭出他心中的“现代的诗”的面目。他在文中标举潘漠华“清幽”,戴望舒“晶莹明澈”,李广田“素朴”,林庚“风韵卓绝”,孙大雨“雄浑明澈”,方敬“富丽”,毕奂午“简洁而幽深”,又认为卞之琳、何其芳有“极美的抒情诗”,沈从文诗“值得较高的评价”;其余受他推许的诗人还有:徐迟、陈江帆、金克木、艾青、玲君、南星、辛笛、林徽因、曹葆华、罗念生、侯汝华等。从这份 1937 年开出来的名单,可见这位年轻人的阅读面之宽广,触觉之敏锐。

事实上,吴兴华在一年前(1936)曾发表一篇《评〈二十四年度中国文艺年鉴〉》,已就该《年鉴》所收入的诗人作过简评,认为玲君、戴望舒、臧克家、路易士、林庚和陈梦家等“比较可注意”,尤其林庚“最近取唐诗的意境融入现代诗,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又说“卞之琳的《鱼目集》里也很有几首好诗”。他根据《年鉴》的选录而得出的个人观感是:

---

① 吴兴华《谈诗选》引恩特美雅《现代美国诗选》前言,见第 111 页。吴兴华未有说明他读的是哪一个版本,笔者只查阅到 1921 年第 2 版,其《序》Preface 并未见到吴兴华所引述的话;Louis Untermeyer, ed., *Modern American Poetry* (revised and enlarged ed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21), pp. xvii-xlvii。

② 朱自清在 1935 年《选诗杂记》中提到新诗的早期选本包括 1920 年 1 月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1920 年 8 月上海崇文书局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1922 年 6 月上海新华书局出版的《新诗三百首》,1922 年 8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1928 年 2 月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的《时代新声》;见《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 卷,第 379—385 页。又参考姜涛《重审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的出版、接受与评价为线索》(新北市:花木兰文化事业公司 2017 年版),第 79—80、100—105 页。

③ 吴兴华:《谈诗选》,第 113 页。

④ 参考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早期文学论初探》,《淡江中文学报》第 18 期(2008 年 6 月),第 225—252 页;卞东波:《〈中国现代诗选〉: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集》,《中山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第 30—40 页。

⑤ 吴兴华:《谈诗选》,第 113 页。

十分露出中国诗坛的沉默。尤其是因为过分迎合时代之故,现代派只能“静观鬓丝的零落”,新月派则歌唱着浮滑的灵感,新兴阶级的一群除了几个比较优秀的诗人(如柳倩、王亚平、田间)外,大都只作了些口号而不是诗。……我们如果把诗和口号分开,则新月现代两派也未可厚非。

吴兴华还在文中评述《年鉴》所收录的小说和散文,总结说:

散文在现代文坛上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了,作家们没有魄力去写伟大的小说,同时又不屑去写诗,这在表面看来似乎也很可喜,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长久这样下去,恐怕文坛前途要不堪设想了。①

今天看来,这位年仅 15 岁的少年对文坛的观察已经颇有定见,其阅读已不仅是吸收知识,更兼有褒贬判断的能力。

至于《谈诗选》一文的结尾,他再举出几个选本:一、《金藏集》;二、孟洛和安得生二女士合编的《新诗》;三、公元前一世纪麦勒亚泽的《诗选》。

《金藏集》,原是法兰西斯 · 特纳 · 帕尔格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 1824-1897)于 1861 年所编的英诗选本 *Golden Treasury of English Songs and Lyrics*,以后不断增益;后来的编者也沿用同样模式,一直有更新版,可说支配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大众读者的英诗认知。② 吴兴华说其中一部分“确使我们省去很大的力量去读专集”;可想知这个选本于他的意义。

吴兴华提到的第二本选集《新诗》即 *The New Poetry: Anthology of 20th Century Verse*(1917 年初版;1923 年增订版),其编者之一孟洛(Harriot Monroe, 1860-1936)是长寿刊物《诗:韵语杂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 1912 年创刊)的创办人;她主编《诗》的态度非常开放,刊物成为早期英美现代主义的阵地之一,也刊载过陈世骧的北京大学老师艾克顿英译的徐志摩、林庚及何其芳的新诗。③《新诗》集的合编者是孟洛的助手,吴兴华说是安得生,并附英文“A. C. Aenderson”,并不准确。这位助手的原名是“Alice Corbin Henderson”(1881-1949),或可译作韩德生。相对来说孟洛和韩德生合编的选本《新诗》没有刊物《诗》般出众,普及程度也不及《金藏集》,但仍是一个有水准的诗选,也增加了美国诗的份量。④

至于麦勒亚泽(Meleager, 活跃于公元前一世纪)的《诗选》(*Anthology*)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希腊诗

① 吴兴华:《评二十四年度中国文艺年鉴》,《青年界》第 10 卷第 2 期,附编《新书月报》第 13 号(1936 年 9 月),第 2 页。

② 参考 Christopher Ricks, “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Treasury,” in Christopher Ricks ed., *The Golden Treasury* (London: Penguin, 1999), pp. 437-450; Marvin Spevack, “*The Golden Treasury*: 150 Years On,” *eBLJ*, 2012, Article 2, pp. 1-17; date of access: 2023-2-28;

以及 Barbara Korte, “Flowers for the Picking: Anthologies of Poetry in (British)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Anthologies of British Poet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d. by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Stefanie Lethbridge (Amsterdam: Rodopi, 2000), pp. 1-32; Kalus Peter Müller, “Victorian Valu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Francis Turner Palgrave's *The Golden Treasury*,” in *Anthologies of British Poet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d. by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Stefanie Lethbridge (Amsterdam: Rodopi, 2000), pp. 125-146.

③ Harold Acton, “Modern Poems in the Vernacular,” *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 Vol. 46, No. 1 (1935.4), pp. 14-19.

④ 参考 Craig Abbott, “Publishing the New Poetry: Harriet Monroe's Antholog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11, No. 1 (Mar., 1984), pp. 89-108; Daniel Göske, “Joint Ventures in a Forked Tongue? Transatlantic Modernism in Poetry Anthologies, 1917 to 1958,” in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Stefanie Lethbridge, ed., *Anthologies of British Poet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2000), pp. 150-155。

选,其存佚过程相当复杂。此集原称 *Stephanos* 或 *Garland*,意指采集花卉,中译或可作《撷英集》。① 我们不能确知吴兴华所阅读的版本,但可以理解他提出这本诗集的想法,好比沈德潜在《古诗源·序》所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读诗要“穷其源”“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②

从吴兴华设定这个评论框架,可知其涉猎之广,眼界之高;而他的评断也有其可取之处;文章的结束语是:

> 我们的新诗却自启蒙而来,一本完美的选本也没有,这是使大众感到无限的失望的。……希望新诗社能在出版《新诗》外,再出一本完美的《现代中国诗选》。这是我们所热望的,我们希望这希望不久就可以实现。③

三、选本与诗学之二:《〈唐诗别裁〉书后》

有关选本的论述,我们也可留意吴兴华在翌年(1938 年)4 月发表的文章《〈唐诗别裁〉书后》。④ 他当时仍是燕京大学西语系一年级学生,文章却发表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的《文学年报》之上。这份水平极高的刊物是燕大国文系的师生所创办,在上面发表论文的重要学者包括郭绍虞、陆侃如、钱穆、容庚、郑骞、杨明照等。吴兴华的文章受到青睐,并非侥幸。这篇文章以文言文写成,讨论清代的重要文学选本《唐诗别裁》。

沈德潜与《唐诗别裁》于现今的文学批评史和唐诗学研究中,并不算冷门的题目;⑤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学界,专门讨论此书的不多。吴兴华对《唐诗别裁》有褒有贬;他批评沈德潜“好穿凿”、不选“香艳”之作、不明白“诗文异途”、专主古诗而绌律绝、“以观唐诗之法观宋诗,而谓宋不如唐”;然而他又称赞这个选本,兼重李、杜,旁及各家,“莫不取其长而抑其短”,“兼收并蓄”,“其于诸名家外,更将旁蹊曲径,各树一帜之作者,亦一一收入”。这些褒贬大体与传统论述同一方向,没有太大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吴兴华的评断标准与评述态度。总括而言,吴兴华看重多元的风格,不偏执一端;又重视形式的意义,反对固守特定体制;在诗学范式方面,讲求开放包容;认为诠释诗篇必须体察语境,反对穿凿附会。看来这种成熟而不保守的观点,在当日足以赢得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编辑的支持,在日后也成为他的诗学发展之基础。文章末尾,他再次表达他的现世关怀:

> 至于现世,尤为衰废,新体诗家,各树一帜,互诋互攻,未知谁是。李杜不复出,人皆自以为真李杜,奈之何哉?日长无事,展读沈编,涉思及此,不觉慨然,聊复书之。⑥

四、现代诗与传统

吴兴华的诗学视野还可以验之于他在大学期间发表的书评。1939 年美国新批评主将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新著《现代诗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radition*, 1939)出版;次年吴兴华在《西洋文学》发表了一篇相当有见地的评论。⑦ 他在篇中介绍了全书各章的内容,特别关注其中论“暗喻”(metaphor)的一章,他认同布鲁克斯之反对浪漫主义的“想象力”(imagination)和“幻想力”

---

① 参考 Alan Cameron, *The Greek Anthology from Meleager to Planud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9-33; Kathryn Gutzwiller, “The Poetics of Editing in Meleager’s *Gar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7 (1997), pp. 169-200。

② 沈德潜:《古诗源·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万有文库版,第 1 页。

③ 吴兴华:《谈诗选》,第 114 页。

④ 吴兴华:《唐诗别裁书后》,《文学年报》第 4 期(1938 年 4 月),第 227—228 页。

⑤ 参陈美朱:《论〈唐诗别裁集〉的“诸体兼善”说》,《人文中国学报》第 28 期(2019 年 6 月),第 132 页,注 6。

⑥ 吴兴华:《唐诗别裁书后》,第 228 页。

⑦ 兴华:《现代诗与传统》,《西洋文学》第 4 期(1940 年 12 月),第 490—491 页。

(fancy)的观点,认为阅读现代诗不能再这样区分;因为现代诗人“所用的暗喻容易趋于怪诞好奇”“叫读者惊异”。① 他又指出本书“写得最好的一章”是对艾略特《荒原》一诗所作的“详细而新颖的分析”;②又认为书中讨论的英美诗人并不足够,随手开列了可以补充的名单。③ 由此可以见到他对英美现代诗坛的熟稔;再参照当时英美学界的书评,可以见到吴兴华的判断也非常接近。④

这篇书评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首先是他借机宣示了他对中国文坛的观感。他说近年英美的“新诗”(New Poetry)“遭到十分严重的反对,那情形和中国不相上下”,“反对者”认为“新诗”舍弃了“光荣的传统”、废弃了“形式”,“根本就不想使读者理解”,他说布氏:

> 试着从一个新立足点来观察所谓“现代诗”,不拿它当一个独立的、突如其来的运动(这是近十几年批评最常犯的错误),而以它为整个诗史的一个环节。这样布氏下了最后的结论,认为现代诗不但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必需的。⑤

在吴兴华心中,英美诗坛的现代诗被视为“突如其来的运动”,就好比论者以为中国的新诗由“新文学运动”而来一样;这是“错误”的观点,“现代诗”是“整个诗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是“传统”的“合理”而且“必需”之发展。换句话说,布鲁克斯关注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正如本书题目——《现代诗与传统》——所显示),这个观察角度也迎合了吴兴华对中国新诗与传统关系、现代诗在中国文学史的位置的看法。

再者,我们也看到吴兴华借布氏主张重编英国诗史,回看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 《重编英国诗史应注意的几点》[按:指原著第十章:“Notes for a Revised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包括许多大胆的论调。作者认为一切市上流行的英国诗史(连古索普 Courthope 的权威作也在内)都是过时不合用了;应该有一本革命性的新编诗史出现。……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我们中国文学史的贫乏,截至现在,一本比较像样的也没有。这巨大的工作将来要归谁担任呢?⑥

由此可见,吴兴华用心钻研西方诗学,并以之为参照,思考中国当代诗坛与文学史的问题。综之,吴兴华对中国现代诗的想法,正是“现代”如何与“传统”构成承传演化的关系。他不同意割裂式的思考,不认为现代文学之于传统是革命式的摧毁与割断;而传统之能延绵不断而不致销亡,就是有包容新变而活化的能力。这种认知,是他的诗学观点的基础。

五、西方文学批评与中国诗学

1941 年 5 月,吴兴华向燕京大学提交他的毕业论文“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

① 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 “Metaphor and the Tradition,” pp. 1-17.

② 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The Waste Land: Critique of the Myth,” pp. 136-172.

③ 吴兴华指出书中除了论及 Allen Tate, T. S. Eliot 之外,还讨论 Robert Penn Warren, John Crowe Ransom, Robert Frost, Archibald MacLeish, W. H. Auden, Yeats。但他认为英国诗人可以补充 Auden 的朋友,相信是指所谓“奥顿诗人群”(“Auden Group”),包括:Louis MacNeice, Cecil Day-Lewis, Stephen Spender, Christopher Isherwood 等;美国方面应该讨论的诗人有:Edwin Arlington Robison, Conrad Aiken 等;兴华:《现代诗与传统》,第 491 页。

④ 参考 William Empson, “Masterly Synthesis,” *Poetry*, Vol. 55, No. 3 (1939.12), pp. 154-157; John Crowe Ransom, “Apologia for Modernism,” *The Kenyon Review*, Vol. 2, No. 2 (Spring 1940), pp. 247-251; Robert Daniel,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The Sewanee Review* Vol. 48, No. 3 (1940.7-9), pp. 419-424.

⑤ 兴华:《现代诗与传统》,第 490 页。又参考 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The Modern Poet and the Tradition,” pp. 69-109。

⑥ 兴华:《现代诗与传统》,第 490 页。又参考 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Notes for a Revised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pp. 219-244。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论文导师是日后以英译《老残游记》驰名西方汉学界的谢迪克(Harold Shadick, 1902-1993)。① 从 1925 年起,谢迪克开始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和历史系任教西方文学与历史;吴兴华在学期间,谢迪克是西语系主任;他俩师生关系融洽,1946 年谢迪克离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远东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客座,两人还保持书信往来。谢迪克在燕大开课时,就有“文学批评”一科;②他也频繁地在《大公报》的副刊《文艺》上发表评论文章。③ 他的批评观念,可见于 1941 年 3 月在燕京大学西洋语文学会的一次公开演讲的报导。署名 J 撰写的报导短文题目是《谢迪克讲文学批评:多读多分析多欣赏》。文中有摘要介绍其讲词内容,包括:

> “文学批评”之定义为何? 由字义言,文学即为书写之文章(writing),批评(criticism)即判断(judgment);合而言之即为文章之判断也。文章判断之法,与自然科学之试验不同。文学之批评包含阅读、了解、欣赏、批评诸方面。……
>
> 普通研究事物有三种观法:(一)真与伪,此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史学所研究者。(二)善与恶,此即伦理学所研究者。(三)美与不美,此即文学所研究者。研究前二类学问之书即传送知识之书,研究第三类之书即移送经验之书。……读传送知识之书,不必详读,只得其主旨即可;读移送经验之书则须字字详读。所谓文学批评则多涉及后一种读法。④

从这里简要的介绍,大抵可以见出谢迪克的批评观念,与从英国剑桥学派于 1920 年代开展的批评理念同一方向。这时剑桥大学从课程设计(English Tripos)、教学方式,以至研究论述,对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之批评导向起了重大作用,文学研究也正式进入重细读、重分析的年代。文学的赏析,于过去只在精英阶层中体现为修养与品味;至此因为方法学上的讲究使文学研究的知识量大大提升,可以抗衡以至改变大学的语言文学系以语文学(philology)为重的倾向。这些英式批评方法,也在 1920 年后期开始撼动中国的文学研究,随着剑桥批评家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79)及其弟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先后来华任教,其影响更为深远。⑤ 燕京大学是承纳这种批评风气较早的校园之一。西语系的毕业论文每有相关的题目,也常见有以中国文学的作家和作品为参照比较,例如:

1. Wu Shih Chang, “Richards’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1932);指导老师:桑美德(Margret Bailey Speer);

2. Fang Chen Ya, “A Study of T. S. Eliot’s Imagery and His Intellectual Interest”(1938);指导老师:步多马(T. E. Breece);

3. Yi Chia Ying, “A Study of the ‘Lyrical Ballads’”(1938);指导老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

4. Yu K’ang Yua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hakespearean and Chinese Theaters”(1939);指导老师:步多马(T. E. Breece);

5. Chang Hung Tseng, “The Ching Hua Yüan: A Chinese Gulliver’s Travels”(1939);指导老师:Harold Shadick;

6. Chang Shu Chen, “*The Story of Tou Ê*: Translation of Yüan and Ch’ing Dramatic Versions with

---

① Harold Shadick, trans.,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又参考 Knight Biggerstaff, Edward Gunn, and Tsu-lin Mei, “Harold Shadick-Memorial Statement,” 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University Faculty, Cornell University; https://hdl.handle.net/1813/18032, date of access: 2023-02-28.

② 参考萧乾:《校门内外》,《萧乾文集》第 5 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1—392 页。

③ 参考凤媛:《从边缘到合流: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新文学教育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69—278 页。

④ J:《谢迪克讲文学批评:多读多分析多欣赏》,《燕京新闻》,1941 年 3 月 8 日。

⑤ 参考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 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940);指导老师:Harold Shadick;

7. Ch’en Tsung-k’uan, “A Translation of Wang Kuo-Wei’s *Jen Chien Tz’u Hua* with Introduction, Life of the Author, Translation of *Tz’u*, and *Shih*, and Notes” (1941);指导老师:Harold Shadick。

吴兴华的毕业论文选取“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为研究议题,就是在这种氛围底下而作。他的论文书目也列有瑞恰慈和燕卜荪的批评理论著述;①在细读以推敲语言的多重意义这个层面上,吴兴华的确受了两人的影响。然而整个论文的理论框架,却源自另一位剑桥批评家蒂尔雅德(E. M. W. Tillyard, 1882-1962)。蒂尔雅德与瑞恰慈同是剑桥大学改革文学课程的关键人物;瑞恰慈原习哲学,师从分析哲学大师摩尔(G. E. Moore, 1873-1958);蒂尔雅德则是古典学出身(classics),两人从不同关注点推动改革。语言哲学的训练让瑞恰慈对字句意义的不稳定性有极大的兴趣,他又吸收了心理学有关意向隐藏的观点,由是聚焦于文本的细读分析;蒂尔雅特则盼望可以从经典学板滞的诠释传统寻求解脱,以相对自由开放的态度发掘文本的意义。年轻的燕卜荪正能发挥老师瑞恰慈的语言歧义论点,在批评理论上有极大的贡献;蒂尔雅特虽然意在冲破古典学牢笼,但他的文本批评却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的味道,比较关怀个别与整体的互动意义,更多关注文学作品如何在传统的脉络中生发新意。② 这些批评观点,就表现在他的《诗之直与曲》(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一书之中。③

《诗之直与曲》分四部分:先有“导言”(Introductory)说明开展诗学上之“直”与“曲”议题的意义,第二部分“直陈”(Statement)以实例剖析诗史上之“直陈”一类,第三部分《隐曲》(Obliquity)从“节奏”(rhythm)、“象征法”(symbolism)、“典故”(allusion)、“情节”(plot)、“角色”(character)、“神话与修辞”(mythology and rhetoric)、“地理”(geography)等七个切入点分析诗意之隐曲,最后在“余响”(Epilogue)部分提出直陈与隐曲在现代诗学发展或消沉之可能性,以及申明本书用心释读诗之隐曲之意义与信念。从结尾一章可以见到蒂尔雅特的关心所在是诗之“隐曲”而不在“直陈”;事实上他在导论已声明:

> 所谓诗之“直陈”与“隐曲”之对立是虚假的。所有诗歌都有或多或少程度的隐曲;世上没有直陈诗。但若果采用“较少隐曲”及“较多隐曲”作为术语,听来会很怪异;为了更明晰和更容易理解,我们迫不得已只能幻构或夸张成这种假设但方便的对立。④

吴兴华基本上就是依循蒂尔雅特的思维方向和理论框架来试验中国诗歌的实际批评。他的毕业论文分七章,第一章《导论》指出中国传统批评之不足,有必要借助蒂尔雅特的诗之“直”与“曲”论述。以下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评论“节奏”“象征法”“典故”“情节”“历史”等“隐曲”的表现方式,最后一章是《结论》。对照之下,可见吴兴华对蒂尔雅特的“隐曲”项作了调整:后者的“角色”“神话与修辞”“地理”三项被移除,新添加的是“历史”。这是因为中西文学传统的差异而作出的改变;例如“角色”在蒂尔雅特的论述中,主要指戏剧和史诗中的人物角色;⑤“神话与修辞”讨论的是读者对之的熟悉度(familiarity),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精英阶层有一套共享的修辞知识,而系统的神话更属于民族的集体记

---

① 吴兴华论文参考书目有:William Empson,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I. A. Richards,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以及 *Practical Criticism*;参 Wu Hsing Hua,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p. 86.

② 参考 E. M. W. Tillyard, *The Muse Unchained: 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ish Studies at Cambridge* (L: Bowes & Bowes, 1958).

③ E. M. W. Tillyard, *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4). 按:此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5 年重新再版,作者在《前言》(Preface)说明新版作了大幅的删减修订;*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5), p. 5. 吴兴华参用的是 1934 年的初版,本文会以此版本为主要根据。

④ E. M. W. Tillyard, *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 p. 5.

⑤ E. M. W. Tillyard, *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 pp. 226-247.

忆;①这两项都在中国文学没有起很大的作用。至于“地理”对蒂尔雅特来说是指向地理作为文学的象征的各种可能性,包括欧洲文学中常见的浪游与空间转换的意义。② 至于新增的“历史”项,吴兴华认为中国诗歌满载往昔历史的典故,有必要另辟一项来讨论。③

吴兴华指出中国传统向来视“史”为“文”(belles-lettres);例如司马迁《史记》的文笔,就深受后世文人称颂赞赏。历史书写讲求笔法,反而不太计较字面所传达史实之对错,别具备一种文学风味。中国没有如西方文学中所承载的系统性神话,而历史却是共享的文化资源;历史中的人事可以触动许多联想,而又有其庄严的性质。④

吴兴华以两个具体的实例来作说明。一是元朝诗人虞集《挽文山丞相》诗:

>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吴兴华指出虞集入仕元朝,要写诗追悼反抗蒙古入侵的文天祥,称颂其高尚的人格,自有其难度。然而虞集借用两位历史人物作比拟,首先是抗秦的张良,原以恢复韩室为志,好比文天祥意欲拯救宋皇朝。张良终于放弃复韩而追随刘邦,意味着文天祥也有所改变。吴兴华特别点出“本”字——原本——指向前后的变化;文天祥未能卫宋,却坚其“正气”之志,“留取丹心照汗青”。其次,虞集又非常恰当地借助诸葛亮之扶助蜀汉来寄意。诸葛亮和文天祥一样试图挽救一个垂危的政权,两人都未遂其志而逝世。诗中似乎在暗讽那些以“顺应天命”来掩饰自己失节的“识时务者”。虞集不愿意认同这种观点,他的意思是:“难道诸葛亮这位古之完人会不明天意吗?”吴兴华认为这些想法如果直白地表现出来,就非常危险;反之,隐曲道之,就不容易被人挑毛病。⑤ 观此,我们或许可以思量一下,吴兴华所论述的“隐曲诗学”,是否与身陷日军统治下的北平的处境有关? 当然他在文中只是提出诗学的解说:虞集此诗以言约而意广的压缩(compression)方式去称颂文天祥。

吴兴华又指出与上述模式相反的另一种表达手法:以多量的历史故实聚合说明单一情事;这就是“赋”的基本作法,而诗词也不无此式。他的例子是辛弃疾的《贺新郎》词:

>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吴兴华指出这个词牌一般以上阕第六句为整首词之关捩,此词第六句是“算未抵、人间离别”,应是写“离别之情”。事实上,吴兴华的英译虽未有说明,辛词原来的词题就是“别茂嘉十二弟”。但他又觉得整首词的历史典故让他有怪异之感,故此一直查究当中是否别有隐曲。后来他读梁令娴的《艺蘅馆词选》,发现有评说可以解破谜底。我们检看《艺蘅馆词选》的眉批说:

> 周止庵云:上半阕北都旧恨,下半阕南新恨。⑥

此一批语出自周济《宋四家词选》;周氏是常州词派的后劲,着眼于词之寄托,评辛弃疾词云:“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可谓得其要领。⑦ 吴兴华依着此一线索,重审词中王昭君、李陵、荆轲等故实,分

---

① E. M. W. Tillyard, *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 pp. 248-257.

② E. M. W. Tillyard, *Poetry Direct and Oblique*, pp. 258-262.

③ Wu Hsing Hua,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p. 12.

④ Wu Hsing Hua,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pp. 69-71.

⑤ Wu Hsing Hua,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pp. 71-73.

⑥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上海:中华书局 1935 年版,第 91 页。

⑦ 周济:《宋四家词选 · 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643 页。

明都指向篇内的政治意涵。至于南北宋新旧之恨,他以为上下阕的用典已有揭示;昭君被迫屈从匈奴,仿如北宋朝之软弱;李陵、荆轲则百战悲歌,奋力抗敌,寄寓了辛弃疾的当世感怀,也指向南宋的最终命运。

吴兴华在本节末尾再简单总结运用历史典故的两种模式:一者以少总多,以压缩为鹄的,通常见于短章;另一种是丛聚铺陈,以多个典故述说同一情事,比较适合在长篇运用。①

在此只举出吴兴华论文所阐述的五种隐曲手法其中最具独创意义的一种,正要说明他虽是借助于蒂尔雅特的论述,却能够加以取舍,作出变通与增补。再者,我们可以注意吴兴华的批评方法与创作思考之紧密呼应,互相支援。这篇论文题作《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论旨在于引进现代的批评方法,以理解传统的诗词,考掘作品深藏的意蕴。然而这些批评的视野却又展现了诗歌创作之际所可运用的表现手法,剖示语言的隐曲如何发挥深层次的生命灵视以及相应的审美经验。可以说,这些探析同时兼具批评论和创作论的意义,也说明他的汇通古今中外的能力。

六、结　语

吴兴华写成毕业论文的 1941 年,才刚 20 岁;他在构思这篇论文的同一年间,另外还有相关的两篇论文《谈诗的想象力》和《现在的新诗》;②两篇文章和毕业论文有不少共通之处,但关怀又别有所在。这些不同的面向,又可以联系到吴兴华诗学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他的人生历程并不算长,但其诗学旅程却异常丰富多姿,其辗转流离,借体再生,更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则传奇。有待另文再续讨论和探究。

Going Back to the Classics and Opening Up a New Way: An Initial Study on Wu Xinghua's Poetics

Chen Guoq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Xinzhu, China*)

Abstract: Wu Xinghua (吴兴华) was a gifted poet who was most productive from the late 1930s to the 1940s. He lived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Beiping (北平)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n experienced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other socio-political changes, and passed away in the mid-1960s. During his brief and shinning life, he produc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brilliant creative and scholarly works and translations, which were ignored and neglected by most literary histories. An examination of his early works on criticism reveals that he was precocious with a poetic consciousness of profundity. He also completed a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entitled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and submitted it to Yenching University (燕京大学) in 1941. Appropriating E. M. W. Tillyard's (蒂尔雅德) theory of "direct and oblique" (直与曲), Wu Xinghua demonstrated a new way of text explication in his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parallel with his practical criticism, Wu developed his unique poetics which culminated and flourished in his later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Wu Xinghua (吴兴华);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poetry anthologies; practical criticism; direct and obliqu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Wu Hsing Hua, "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pp. 73-77.

② 吴兴华:《谈诗的本质——想象力》,《燕京文学》第 2 卷第 4 期(1941 年 5 月),第 15—16 页;钦江:《现在的新诗》,《燕京文学》第 3 卷第 2 期(1941 年 11 月),第 2—5 页。